

桐城
历史
文化
丛书

桐城

明清名宦

江小角
吴晓芬

编著

安徽美创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NGCHENG MINGQING MINGHUIAN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从桐城走出去的历代为官者，无论官职品阶高低，处世安稳与动荡，大都能廉洁自律、秉公直言、勤政为民、兴教育才、尽忠报国，尽显桐城人的智慧与勇气……



桐城历史丛书

桐城

明清名宦

江小角
吴晓芬 编著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从桐城走出去的历代为官者，无论官职品阶高低，处世安稳与动荡，大都能廉洁自律、秉公直言、勤政为民、兴教育才、尽忠报国，尽显桐城人的智慧与勇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城明清名宦 / 江小角, 吴晓芬编著. —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1.8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7-5398-2920-3

I. ①桐… II. ①江… ②吴… III. ①政治人物—列传—桐城市—明清时代 IV. ①K8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259号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 戴逸

编委会主任: 胡连松

编委会副主任: 王强 汪莹纯 吴三九 娄雪松 胡睿
徐家涛 何炜 王靖华

编委会委员: 杨怀志 江小角 潘忠荣 方宁胜 唐红炬

丛书主编: 杨怀志 江小角

丛书副主编: 潘忠荣 方宁胜 唐红炬

丛书统筹: 胡睿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

桐城明清名宦

江小角 吴晓芬 编著

出版人 郑可

责任编辑 欧阳卫东 张李松

策划 田海明 韩进

责任校对 陈芳芳

项目总监 武忠平 陈涛

装帧设计 武忠平 陈涛 陈远

项目助理 王爱华

责任印制 李建森 徐海燕

特约审读 欧阳发 吴为奇

出版发行 安徽美术出版社 (<http://www.ahmscbs.com>)

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3533604 (省内) 0551-3533607 (省外)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 书号 ISBN 978-7-5398-2920-3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序一

戴逸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桐城文化真正产生影响应该是在明清两代。明代中后期，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达官显宦、文豪诗人接踵而出。他们或以气节名垂青史，或以结社各领风骚，或以文章传诸后世，或以讲学名扬四方，或以政声享誉朝野。清代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流衍区域最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得名是由于它的先驱者戴名世、创始者方苞、发展者刘大櫟、集大成者姚鼐皆为桐城人。再有方东树、刘开、姚莹、戴钧衡、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后继者不断传播，创下了中国文坛特有的奇观。直到清朝末年，李鸿章还说：“今天下古文者必宗桐城。”桐城派的散文创作和文论主张，被清朝统治阶级视为正统文化，对促进满汉民族融合，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桐城文化在明清时期影响巨大，毋庸置疑。

由于编纂清史，我有幸再次认识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它的重要性、价值和影响都不容低估。从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来看，清代桐城派传承了六七代，前后二百余年，从康熙时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从方苞到范伯子，可以说是薪火相传。学术的发展一定是团体的发展，仅仅依靠某一个体是不够的。中国学术的发展要靠学派，这个学派一脉下来，时间要很长，只有绵延不绝，才能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国的文学流派，从散文来讲，《左传》下来是《孟子》、《荀子》，此后隔了几百年转到《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之后又没有了，转到六朝骈文，韩、柳、欧、苏一代二代而终。韩愈的传人有李翱，苏轼的传人有秦观、黄庭坚，再下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文坛很少有像桐城派这样的文派，“代有传人”是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桐城派能够延续下来，并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个特点值得研究。桐城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仅有文学实践，而且有其理论：方苞提出的“义法”，刘大櫟提出的“神气”，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姚莹再加一个“经世”。桐城派在五四运动中受到抨击和批评，是因为作为当时势力最大的文学流派，有些方面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批判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发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论，矫枉过正，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是不破不立。虽然陈独秀等人的言论有片面性，但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功绩是伟大的。至于他们的一些激烈言论，我们今天应该冷静对待。而至于桐城派，我们更不能把他们的文章都当成糟粕，一

概扫进垃圾堆。实际上，五四运动人物的古文修养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了解古代文学的精髓。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美。这些都是文学的要求，不能算是错误的。五四运动中批判“言有物”，实际上批判的是程朱理学。其实桐城派的很多文章都不是讲理学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文章讲究形式、讲究艺术、讲究结构和方法，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说它讲得不够，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说“言有序”有问题。当时将桐城派的文章比作“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与八股文是不一样的，虽然桐城派中的许多人（如方苞、戴名世）善于作八股文。桐城派的文章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讲学理的文章，有叙事的文章，有描写景色的文章，有写人物的传记，并且形式也是曲折变化，不是千篇一律。这也是桐城派的价值之一。

现在强调要重视对桐城派的研究，另外一个原因是桐城派文学创作的力量之源在于它创新求变的进取精神。桐城派既不拒绝和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也决不望着前人的项背止步不前；既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养分，也对传统实行有限的“背叛”；既不数典忘祖，也不因循守旧，他们的文论思想始终强调一个“变”字。因此，桐城派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狭小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完善系统，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桐城派强调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始终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到晚清时期，世变日蹙，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薛福成主张振兴工商经济，吴汝纶力倡新学，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文学名著，这些都是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创新求变的体现。所以，桐城文化也好，桐城派也好，都是尚待开发的文化资源富矿，我们应该去发现，去开发，去利用。

我虽然没有去过桐城，但从《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的申报与整理以及同志们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桐城市的领导非常有眼光，支持项目申报，重视研究与弘扬桐城文化，积极承担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体现了文化自觉。现在他们又要编撰出版一套《桐城历史文化丛书》，全面介绍桐城文化的丰厚内容和辉煌成就，旨在宣传桐城，提高桐城的知名度，提升桐城的影响力，意义十分重大。现将自己关于桐城派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作为这套丛书的序。



序二

戴廷杰[法国]

残冬之晨，寂寥读书窗下，忽得江君小角万里函，云有桐城丛书一编，将刊行于世，请为之序。予虽间握笔伸纸，似有立言之志，才短学薄，远西之微士而已，何敢应江君之请，而为数行以弁扬龙眠盛迹之鸿篇？无乃所谓着粪佛头乎？幡然思之，蒙如此之宠荣，遇如此之笃眷，奚可推辞，而或至蔑江君之友谊，逆东西之交流？昔者潘木厓先生，家藏书万卷，以为书公物也，不能私。今江君等人承先辈之遗风，不惧推其意，以斯文为天下之公物，岂非当世之大快事哉？然则不肖外人，洵无从逃避，不得不讷讷数言以归之。

廿余年前，肄业既毕，敝国史家龙先生巴尔，评予所为南山文祸之论文曰，生之大作，余甚喜之，惟历史与舆地，相为表里，不能分其学，重此而轻彼，生其尝游皖乎？赧然曰未往。退而太息，龙先生展阅拙文，一目了然，知予之足未踏桐城之土，予之口未吞龙眠之气，则岂不杰以南山先生所居之故乡为南山先生所记之意园，即以有名有实之旧县为书生意中之幻景乎？久之始下云楼而东，入北峡关，以至县治，乃皖然盱衡，四眺而叹曰，嘻乎，此是吾书中之桐城欤！若是万户之邑，百里之域，视四海之广，弹丸黑子耳，而其名垂宇宙，数百年之久，人之以巍科达官者，震耀天下，不可胜计，文之以精辞微理处，脍炙人口，曷可胜书，甚至为有清一代之正宗。此诚为中国历朝之所罕有，欧洲诸国之所未有矣。遂往视惜抱先生之树，过千载紫来之桥，东而登南山之墓，西而攀相国之陵，漫游平野，往来阡陌，观农夫之力耕田间，居民之勤治生产。予每游龙眠山之麓，虽不过一二日，犹足以知土田之肥沃、物产之丰夥、天地之神灵，而冥然潜心，溯流穷源，庶达至盛之泉。

夫斯文之兴于富裕，此天下万世之公理也。如大江之南，数百里而遥，即徽州府，以山多田少，人多释耒服贾，其商之豪富，士之贤才，遐迹莫不闻，故有商而兼士之说。兹窃其意曰，农而兼士，士而兼农，不亦桐城盛兴之机乎？然此言大旨耳，公理之象也，不足尽龙眠之所独有，善地之所奇特，而尤不克明其所以然者，是则斯文之统，安得存而不绝，累世荟萃，相继绍之以至于今乎？予翻阅龙眠之文久矣，虽稍知其大略，偶窥诸事之故，仅得其一二，而未之详。幸而予之蒙将发，非以恍然之大悟也，先正后学数君实为之矣。盖此数君者，与江君同志，慨然以传文统为任，以守遗绪为责，因博征龙眠之文献，以阐曩日之事、江山之胜、民间之俗、望族之法、登科之术、仕

途之道、文风之变，且无论耀光幽德，穷搜先辈之古文诗词，以拔其尤者。所辑所择诸珍，渐渐满筐，所辨所论诸作，冉冉盈筐，甚至成全璧，乃分若干篇，合为八册，名曰桐城历史文化丛书，而付之刊刷，以公海内。其书若龙眠乡之田园也，郁郁兼茂，有岁熟且丰，有实甘且多，终可止学者无穷之饥渴，兼补海隅书生之意园之所不能殖，岂不天下斯文之大盛事哉？于是书此数言以为序，江君其许之乎？

辛卯春日，戴廷杰拜题于巴黎寓中。



序三

胡连松

安徽素称文化大省，安徽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术界通常根据区域文化特征，把安徽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桐城文化、徽州文化和淮河文化。从文化内涵来说，徽州文化内容繁富，涉及面广；淮河文化传统意味浓厚，时间跨度大；桐城文化主流意识强，对人性的关怀和制度的创设具有积极作用。桐城的文派、学派、诗派、书画派，以及丰富多彩的桐城民间文学，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桐城文化的创造力、吸引力、感染力和无穷的魅力，所以，学术界有人认为桐城文化是精致文化。

我们今天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怎么弘扬，弘扬什么，是大家必须要正视的一个严肃话题。桐城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宣传它？这是所有关心桐城文化、热爱桐城文化的人，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桐城文化始于唐代，成名于宋代，崛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一代代学者、一批批官宦，他们都坚守传统，热爱自然，心忧国家安危，情系黎民百姓，把中国士大夫、文人阶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以济世救民的胸怀积极入世，这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他们创作的文章，题材丰富，礼、乐、兵、农和国计民生，无不涉及，包罗万象。许多人弃官从教，以传授知识为乐，同时结交百姓，关心民众的疾苦，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桐城文人士大夫发出的呐喊声音。从我个人对桐城文化的认识来看，桐城文化的主要精神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首先，桐城文化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从历次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和桐城文人对为国献身者的歌颂来看，无不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在国势衰微的情景下，桐城人表现出来的爱国立场更坚定，不但写出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华丽篇章，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鼓舞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击侵略，而且为时贤、名宦献计献策。姚莹“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积极建议并全力支持林则徐禁烟，站在人民一边，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他在台湾的抗英事迹，可歌可泣。与此同时，许多桐城人与时俱进，提出了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富国强民、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例如，国学大师吴汝纶关注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对进化论在我国的传播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给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书作序，还提出修改意见，并四处托人帮助销售，以扩大其影响，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思想，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其次，桐城文化体现了追求文明、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在桐城，读书习礼成为时尚。明清两代，桐城“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开办乡学，口传笔授，教学相长，革故纳新，在科举仕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桐城祖训，充分体现了桐城人刻苦励学、知书达理、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

再次，桐城文化体现了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平等精神。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桐城先贤对父母敬爱有加，笃守孝道；兄弟之间，相互扶持，至老不衰；对宗亲，体恤周济，不遗余力；对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邻里相处，以礼为先，以和为贵，以让为贤。日常生活中，处处都体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崇高风尚。乾隆年间，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草根树皮掘剥殆尽。身为一个穷儒的桐城派宗师刘大槐焦急万分，建议在乡里建立义仓，主张藏粮于民，要求乡里名流及富户捐资救助贫困交加、求救无门的人。此议被当政者采纳，饥民大受其惠。清代大学士张英谦让邻里，让出一个名扬天下的“六尺巷”。如今，他在家书后亲批的诗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早已流传海内外，成为解决邻里纠纷的最好范例。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桐城参观六尺巷时指出：“六尺巷在历史上是宰相以宽厚的胸怀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留下的，在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动教材。”

我去年当选为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思考如何利用研究会这一平台，来宣传桐城文化，研究桐城文化，弘扬桐城文化。这次研究会组织专家学者，编撰《桐城历史文化丛书》，我非常高兴。这不仅为宣传桐城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也是响应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的号召，推动安徽地域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所以我非常乐于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宣传、呼吁。通览全书的大纲和篇目，感慨良多，写出上述体会和认识。



序四

王强

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因为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桐城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桐城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令人惊羡的文化奇迹，催动着恢宏的文学景象不断萌生。尤其是清代以降，桐城派异军突起，一时间“家家桐城、人人方姚”，风骚独领，蔚为大观。后世文人回首这一奇丽的文化现象，也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历史烟云消散，文化魅力永恒。地域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地方精之所存，气之所蕴，神之所附。回眸既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已被桐城人民深深铭刻在岁月深处，而在发展车轮的滚滚节拍中，桐城踏实而从容的前进步点，又不断叩击着崭新的梦想。在关山飞渡、踏浪前行的历史进程中，桐城文化中所蕴含的忠诚务实的报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谐精致的处世理念，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仍是桐城人民引以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本质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文风昌盛的江淮名邑、风光秀丽的皖中胜地、百业兴旺的和谐之城，桐城以全方位的改革创新，迎来了全方位的兴盛与繁荣，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一座城市的精魂，它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先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

我虽不是土生土长的桐城人，但我对桐城的认识、了解、倾慕由来已久。在我的故乡宿松，至今仍然流传着一代大儒朱书与桐城派开创者戴名世、方苞抵掌论文、击节而歌的动人故事。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常常于不经意间，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与吴汝纶、姚永朴、马其昶、朱光潜等桐城名士留下的燕园往事不期而遇，感动之情油然而生。今年初春，我带着组织上的信任和厚爱来桐城工作，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散发的浓郁人文气息和绵延不绝的创造力量。我认为，文化底蕴深厚是桐城发展的优势所在，在桐城，不注重桐城派的研究与挖掘，不重视文化工作，在政治上就是不敏感，在经济上就是不内行，在文化上就是败家子。民族之魂，文以化之；城市之魂，文以铸之。文化一旦“缺位”，就意味着桐城在未来竞争格局中的“失位”。当前，桐城正处在争先进位、追赶跨越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在安庆当龙头，做表率；在全省争位

次，进‘十强’；在全国创品牌，树形象”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抢抓融入合肥经济圈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实施的大好机遇，发挥桐城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文化优势，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着力推进文化强市，力争早日把桐城建设成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先行区和试验区，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增强实力、激发活力、彰显魅力，需要我们进一步继承、发扬和光大桐城优秀的历史文化。

《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桐城的科举风貌、名宦风采、文学风姿、民俗风情和名胜风光，可谓荟萃众美，通贯古今，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桐城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又是继承和发扬桐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文化的延续性在于继承，文化的包容性在于开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当然不是抱残守缺，守旧复古，而是在发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创造出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的文化产品和新的文化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增长点。《桐城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出版，无疑在这方面起到了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到发掘、研究、宣传、弘扬桐城文化的行动中来，续写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世的文化新篇！

是为序。

前言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古代官员选拔、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古代社会进与退，百姓安居乐业乃至国家长治久安与否，都和官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好官、清官，不仅常常作为小说、舞台戏曲中的正面形象去描绘、渲染和歌颂，而且也是百姓寻常生活中常常念叨的话题。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成为古代为官者的座右铭。从桐城走出去的历朝历代为官者，无论官阶高低，身处之世稳定与否，大多数人都能尽忠报国、勤政为民、兴学育才、廉洁自律、秉公直言，体现出桐城人的聪明才智。

本书所言名宦，一是指在中朝中任职尚书、侍郎，在地方任职督抚的要员；二是指政绩突出，影响深远，对后世有示范作用的府县官员，他们品级虽然不高，但从对后世的影响力来说也堪称是名宦。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检阅、分析，粗略得出桐城古代官员有如下特质：

忠贞爱国。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桐城人同样予以继承和发扬，在一些官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抗倭名臣阮鹗，还是保卫台湾的姚莹，从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出桐城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明朝嘉靖时期，浙江、福建沿海等地，倭寇猖獗，侵占岛屿，杀人越货，为害甚烈。一些官员为了个人安危，想招抚了事，但阮鹗坚决主张歼灭寇贼，并亲自率领诸生、壮士，斩杀倭寇，深受士民爱戴。后遭御史宋仪望弹劾诬陷，罢官下狱。他在押解途中，经过杭州时，百姓纷纷前往岳飞的岳武穆祠，替阮鹗祈祷，盼望他逢凶化吉。后来经过闽浙官民的多方营救，阮鹗幸免一死。到明朝隆庆时期，终于平反昭雪；万历时期，赐御葬，入乡贤祠和浙江名宦祠。姚莹对台湾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先后任职知县、通判和兵备道。他针对台湾境内高山族、汉族杂居引起的一些矛盾，一方面铲除强暴，打击黑恶势力和犯罪分子；一方

面改造仰山书院，传播文化知识，教以礼让，引导民众朝着文明的道路前进。道光时期，英国侵略者进犯台湾，姚莹和总兵达洪阿认真分析形势，率领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取得了抗英斗争的巨大胜利。后来姚莹因遭到闽浙总督怡良和两江总督耆英等人的诬陷，以“冒功”之罪，革职下狱，这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震动，台湾军中千余人攘臂欢呼，幸亏达洪阿亲自到士兵中进行开导，才未引起兵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朝廷将姚莹释放出狱，贬官四川。不久，又差遣到西藏。姚莹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详细考察西藏的风土民情，撰写《康輶纪行》一书，揭露英、俄等国企图侵略西藏的野心，建议朝廷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清末江西南昌县令江召棠秉公处理教民事件，遇刺被杀，酿成震惊中外的“南昌教案”。“南昌教案”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一场伟大斗争，历史把江召棠和这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后人的尊敬与怀念。由此可见，这些先辈们在横遭诬陷、冤屈难伸的情况下，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情系国家安危，这种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施政为民。做官要为民做主，是历代情系百姓的为官者的写照，桐城许多为官者更是如此。明代永乐时期，朱善远赴云南，任职鹤庆府同知，刚刚到任，适逢灾荒，民不聊生。下车伊始，首先将自己的俸禄捐出，救济灾民；然后上奏朝廷，请求开仓赈灾；同时，还打击偷盗行为，保障百姓生活安定。康熙年间，姚文熊到陕西阶州任知州。阶州地瘠民贫，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每年纳赋之外，还要交附加钱粮。姚文熊理事后，决定免征附加钱粮。上级官吏仍旧派员前来催缴附加钱粮，姚文熊下令将其中骄横跋扈者捆打后，赶出辖区。后遭上官弹劾，降职归里，他泰然处之。康熙年间，倪灏调到湖广南漳任知县，刚到任，就遇到饥荒，下令发仓粮赈灾，仓吏坚决不同意，要见上级批文才能开仓赈灾。倪灏说，公文往来需要月余时间，等批文来了，必有半数饥民饿死，开仓固然要从严把握，但我愿意以官职换取饥民性命。雍正时期，方求义代理安远县事，时值饥荒，上司不许开仓卖粮。他慷慨陈词，仗义执言，认

为藏粮的目的就是为了救灾。他说：“有灾不卖粮，藏粮何用？”于是倾仓出售积粮。抚军知道此事后，嘉奖他果敢为民，并具文他县，照此为例。他去世后，刘大櫟为其立传，袁枚给他撰写墓志铭。乾隆时期，倪企望任山东长山知县，潜心替百姓办事，任职期满后，长山百姓奔走挽留。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布告僚属：“为州、县者，俱当以怀宁令左辅、长山令倪企望为法。”嘉庆时期，朱杰在任上开仓赈灾。御史借口其专权，对其弹劾。嘉庆皇帝知道后，说朱杰是“实心任事”，予以褒奖。后来因事革职，巡抚奏请留任，嘉庆帝在奏章上批曰“朱杰得民心”，加恩留任。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桐城人官做到哪里，就把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带到哪里，做到为官一地，兴业一方。明朝嘉靖年间，赵钱任金都御史，巡抚贵州。他发现当地民风淳朴，但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百姓甚至不懂得引水灌溉，许多肥沃田地废弃抛荒。赵钱至此，“教民引水为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公抚黔久，政化流闻”，不仅得到嘉靖皇帝的赞许，而且深受贵州百姓的爱戴。后世有人赞曰：正（德）、嘉（靖）时有两名臣，一为廉使齐公蓉川（齐之鸾），一为中丞赵公柱野。明万历期间，盛世承任职陕西，率众开垦河滩之地千余顷，后成为秦中膏腴之地，百姓受益无穷。其时，孙继陞在江苏海门任职，适逢大旱，他因势利导，疏通沟渠，修建石闸，引水灌溉，根据需要关闭自如；还使泛海商船，都从海门闸进出。第二年又遇洪水灾害，泰州、通州、海门三地及如皋等地的洪水都从此闸排出，田庐无损，百姓称此闸为“孙公闸”。江之湘在四川峨眉任知县，境内有一白鹤潭溪，百姓涉水过溪，常常有人沉溺而亡，成为百姓心头之患。江之湘带头捐资修桥，整治溪水，从此水患消除，百姓改“白鹤潭”为“江公潭”。康熙时期，钱旆任四川苍溪县知县。此地贫瘠荒芜，民智未开。钱旆一面革除苛税，一面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大兴水利，筑堤蓄水，灌溉农田。还教百姓种桑养蚕，发展家庭手工业，民富税丰，受到督抚褒奖。乾隆年间，姚棻在甘肃靖远县任知县，教百姓置水车溉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开山修路，发展交通，建立兴靖堡集市，货畅其

流，繁荣贸易，使靖远成为当时的殷实之地。张若澍到浙江任职，请求朝廷把陆耀所写的《甘薯录》颁发浙江各地，让百姓学会种植，给百姓生活带来新的粮源，大大提高了百姓抗灾、御灾能力。光绪年间，江召棠在江西上等地任知县长达十七年，每到一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兴办新学，教化民众，留下了诸如“江公桑”、“江公堤”、“江公藏书楼”等永远让百姓铭记的“政绩工程”。百姓称他为“江青天”，为他建立生祠，替他祈福祷告。这在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成风的清朝末年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像他们这样不顾个人荣辱，真心替百姓办事的好官，在桐城的为官者中举不胜举。

打黑除恶。打击黑恶势力，替百姓伸冤，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也是最善良的普通百姓对地方官员的期盼。嘉庆时期，张裕勳任广西阳朔知县。阳朔地处西南边陲，常常有外匪入境行劫，他厉行保甲之法，冒险亲自查缉犯罪分子，没有多长时间，行劫之匪，捕获殆尽，百姓得以安枕无忧。乾隆时期，姚棻到皋兰县任知县，境内有巨匪马得鳌，出则为盗，入则扰民，党羽众多，抢劫官府，掠夺百姓，无恶不作。姚棻深入了解其活动规律，精心策划抓捕方案，终于一举消灭了这个危害一方、让百姓寝食难安的黑恶团伙。百姓闻讯后，欢呼雀跃。乾隆皇帝也为此事下谕旨称赞：“姚棻一经委派，即兼程探获巨窝，颇属能事。”后来，姚棻调到武昌等地任职，面对那些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不畏艰险，除暴安民，坚决打击不法之徒，“豪猾敛迹”，百姓生活得以安宁。道光时期，广东揭阳县社会动荡不安，黑恶势力猖獗，“视劫夺杀人为故常”，“强者不输赋，勒税商贾”，境内商人不敢设铺，百姓不敢赶集，集市荒废，货物断流。姚柬之上任后，明察暗访，走访百姓，在掌握土匪活动情况后，当众宣布：“吾治斯邑，不爱官，不爱钱，不畏死，有梗吾治者，锄之。”他敢于以狠治恶，毫不手软。从上任之初，就以高压态势，打击黑恶势力。姚柬之铁腕治匪，使揭阳“一境晏然，商贾为通”，成效显著。姚柬之离开揭阳时，“揭民泣走送者万数”。这些以实际行动去爱民为民的亲民官吏，当然受到百姓的拥戴。

注重名节。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非常讲究气节，这些在桐城人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从方法到左光斗，再到张秉文，无不视名节如生命。永乐元年（1403）朱棣称帝，诸藩王及臣僚纷纷表示庆贺。方法此时在四川任都指挥使，他效仿宗师方孝孺，拒不署名，遂遭逮捕，在押解途中，投江自尽。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独揽朝纲，许多人巴结都唯恐不及，而桐城人张淳，虽是张居正提拔的礼部郎中，但宁可辞官归里，也不接受张居正的请托，违心做事。明熹宗时，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胡作非为，许多桐城人为了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生活，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先是巡抚方大任弹劾魏忠贤，反遭其报复、栽赃，流放外地。其次是左光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上疏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可斩”之罪，也反遭迫害，摧残致死，其兄左光霁株连致死。再有方孔炤，不顾个人安危，蔑视魏忠贤的淫威，在朝堂之上，公开站出来，反对熹宗赐封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为肃宁伯，认为这不合国法祖制。此举大大触怒了魏忠贤，其党羽爪牙使出浑身解数，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方孔炤，方孔炤被削去官职。还有时任礼部侍郎的何如宠，眼看杨涟、左光斗等人遭到陷害，想法搭救。魏忠贤及其亲信知道后，立即上疏弹劾何如宠，理由是何如宠与左光斗都是桐城人，同乡好友，交谊深厚，属于同党，因此何如宠也被削职。桐城的这些官员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一幕惨烈的忠奸较量的大戏，尽管邪恶势力暂时得逞，但名垂青史的是那些忠贞之士。崇祯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左德球被选授广西同知，友人都劝他不要去赴任，左德球却说“国家多事，正臣子效死之秋”，携妻儿及时到任理事。后升任湖广沅州知州，清军攻下沅州，左德球以脑触石而死。崇祯时，张秉文在山东为官，清军攻打济南城时，他在给家人信中写道，“身为大臣，自当死于封疆”，“男誓以身报朝廷”。最终张秉文战死济南。清乾隆年间，赐谥“忠节”。

兴学育人。桐城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书，到了明清时期，读书之风尤盛。许多人依靠读书，走上科举、为官之路。那些外出做官的人，官做到哪里，也把桐城人“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优良传统带到哪里。每到一地任

职，总是察民风，观民俗，建文庙，兴学校，培养人才。明朝景泰年间，韩隆任福建永安知县，此邑地险民刁，习俗不正。韩隆尽心为百姓办事，修筑城垣，建立学校，教民读书，提倡礼仪；同时，辨判疑狱，审案公正，一时间永安风气为之大变。韩隆也因此受到百姓爱戴。萧世贤到浙江任嘉兴府知府，大兴学校，培养诸生，一府之内，文风蔚兴。朝廷考核，治行位列第一，迁升湖广副使。汪淳在江西玉山任知县，修建端明书院，集合诸生，亲自授课。也因治行突出，升任广西梧州知府。姚之骥到湘潭任知县，宽厚待民，尤其注重学官教育，勤于课士，把教育作为自己施政的第一要务。据伯昆任江西武宁知县时，政清讼简，兴学课士，选育人才，同时均赋清亩，让百姓得利，以治行征试广东道御史。姚文烈在汉阳为官，打击豪强，平反冤狱，扶危济困，为百姓创造安适的生活环境。他在办理官府公务之余，就到书院去讲经论史，课艺授文，还常常告诫诸生：“读书，当出为名宦，处为真儒。”后因治绩突出，他升任云南楚雄府知府。清嘉庆年间，谢益任河南汜水知县，勤于政事之余，潜心发展教育，课徒授学，亲自担任嵩阳书院院长，后歿于讲舍。还有像张廷璐、张廷瑑这样的地方教育最高长官，更是以兴教为第一要务。张廷璐在正文体、选拔人才等方面，卓有成效。时人赞誉他在学政任上培养的人才，“足备国家数十年桢干之用”，其功尤巨。他任职期满离开江苏时，百姓“皆环泣走送，千里不绝”。张廷瑑在学政任上，亲力亲为，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受到朝廷嘉奖和皇帝赞誉。张廷璐兄弟逝世后多年，乾隆皇帝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张廷瑑兄弟皆旧贤臣者，今尽也！安可得也？”从许多资料来看，明清时期，江南学风大盛，这和桐城人在此地为官，全力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革除旧俗。桐城人在一地为官，除了大力发展教育之外，对有些地方的不良习俗尽力予以革除。明朝隆庆年间，张淳到浙江永康任知县。其时，永康土地贫瘠，百姓穷困潦倒，生下女孩，大多弃而不养。张淳了解情况后，不断训诫弃养女婴者。他说，豺狼虎豹都知道爱子，弃女行为，“狠于豺虎也”，